

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平民教育運動

侯傑 馬曉馳

[提要] 1895年，中國第一個城市基督教青年會在天津建立，立足於公立學校開展各項事工。二十世紀20年代，由於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參與和天津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導，天津平民教育逐步出現高潮。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秉持“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理念，將興辦平民教育作為宣傳社會福音思想的重要舉措。其下屬的職工部及聯青社、勵青社、福利團、少年求是團等社團和組織除致力於創辦平民學校、興辦專門女校外，還通過舉辦科學講座等形式，開展針對性強、靈活多樣的活動，從文化素質、生活方式諸多方面改變包括普通民眾在內的天津社會各界人士之思想觀念、社會實踐，參與城市建設。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平民教育活動加快了教育大眾化的發展步伐，在開啟民智、普及文化知識、推動天津城市現代化等方面均有所實踐，功不可沒。

[關鍵詞] 基督教 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平民教育 城市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 B97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3 - 0077 - 08

一、範式轉換：全球地域化視野下的基督教青年會研究

作為一個跨宗派基督教團體，基督教青年會自1844年在倫敦建立至今，已有170多年的歷史。自十九世紀後半葉傳入中國後，它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革息息相關。其中備受關注的問題之一便是基督教青年會的本土化問題：基督教青年會登陸中國之後如何結合不同的地域文化，進而成為在近代中國影響至深的基督教團體？這一研究領域也經歷了數次範式轉移。其中，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諸多範式都得到了有效應用，如傳教學、西方中心論以及中國中心觀等。^①

傳教學範式之下，學者們更重視基督教青年會對宣教事業的貢獻，意在解釋神職人員們推廣社會福音時所做的工作，及具體手段和措施。亦有學者受費正清“衝擊—回應”範式^②以及列文森“傳統—現代”^③範式的影響，以西方為中心，認為對於近代中國而言，作為外來因素的基督教青年會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文化，而且試圖重建中國人的心靈，對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價值體系、政治權威形成強有力的挑戰，為其輸入現代性。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相關研究衍生出幾種新的範式，較有代表性的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範式以及“現代化”範式，意在將基督教青年會在華歷史視為兩種文化的相遇，以中性和超然的心態探討其中的過程和規律，但存在過於關注狹義的文化現象等弊病，並忽視了基督教青年會所傳播的西方文化相對於中國而言，註定是一場

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對話，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的滲透。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受到柯文“中國中心觀”^④的影響，部分有關基督教青年會在華歷史的研究從區域個案入手，關注中國基督徒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意在闡明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社會的互動。

另外，社會理論家羅蘭·羅伯遜於1992年提出的“全球地域化”概念具有以下內涵：“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既是一體化，又是分散（多元化）……它是全球與地方同時存在與相互滲透。”^⑤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不同地方的傳播擴展，雖然都是伴隨其全球化進程而進行的，但不能避免地方化的命運。

在“全球地域化”視域中，基督教青年會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地方基督教”。其中，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基督教如何適應各地的文化；二是各地文化元素對基督教信仰產生的影響。^⑥這種研究範式既關注基督教文化源流中的西方元素，也重視基督教傳入中國各地後所具有的特色；不僅看到基督教在全球擴展的主動性，也注意到地方社會的自生因素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這緩和了“以中國為中心”或者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範式所加劇的強勢與弱勢、主動與被動的矛盾衝突。

聚焦地域個案，有利於凸顯“全球地域化”之於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歷史研究的價值，可以避開空泛地討論所謂“中國”的問題，充分考慮不同地域的社會、經濟、文化因素。^⑦天津青年會正是這樣一個區域個案。在近代中國，天津兼具沿海、重商的雙重屬性。直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它還有靠近統治中心的優勢。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交流與互通、衝突與角力在這座城市中不斷上演。這使得在天津紮根、登陸的基督教青年會從一開始就力圖促進基督教與地方社會、文化的交流互通：包括制度建設和信仰、文化認同建構等。當基督教青年會接觸天津社會後，它既成為被地域化了的基督教青年會，又是全球化的青年會呈現給世人的歷史和現實樣本。

1895年10月，來會理^⑧由北美協會派遣來華，同年12月創立天津青年會，這是中國第一個城市青年會。^⑨1897年6月，天津青年會大沽路會所建成，以開設查經班和開展籃球體育活動為主要事工。1901年，第一位華人幹事宋愚溪來到天津青年會。1909年，九位華人當選青年會董事。張伯苓還於1911年和1920年兩度擔任董事會會長一職。天津青年會於1914年搬遷至東馬路新會所，擴大了事工的範圍，開始進入新的發展期，活動內容涉及教育、體育、音樂、慈善救濟、醫療、創辦電台等。抗戰期間，天津青年會轉移到法租界會所，堅持開展相關救濟工作。以下將著重探討天津青年會與平民教育的相關問題，尤其關注天津青年會當地語系化的進程。

二、自西徂東：天津青年會與平民教育的發展

“平民教育運動”是指二十世紀20年代初，基督教青年會重要代表人物晏陽初在全國範圍內發起的以“破文盲，塑新民”為目標的社會教育運動，其推廣路徑顯現出“由全球及地方”的特色。這場運動發端於基督教青年會服務世界的理念，從發起到推廣都與基督教青年會、近代中國留美學生有著密切聯繫。

梁冠霆指出，美國參與一戰的行為及其宣傳，開始令中國留美學生無法認同“基督教美國”所代表的基督教形象，巴黎和會使“基督教美國”所投射出來的民主理想和世界秩序全然失去了說服力和吸引力。同時造就了留美中國青年的一次跨階層體驗，他們認識到平民才是中國的信仰載體，普遍國民的身份自覺是建立理想政治秩序的先決條件。^⑩

平民意識的滋長，使部分中國留美青年認識到，推動平民教育事業乃是建立上帝國度的前

提。北美中國學生聯合會將法國華工納入服務範圍，晏陽初^④便作為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加入到華工服務的行列，耳聞目睹了在法中國勞工飲食不足、語言隔閡，思家之情日切，不滿情緒日盛，各處華工連續發生罷工和互毆事件。基於“開通華工的知識，輔助華工的道德，聯絡華工的感情”之目的，晏陽初創辦了基督教青年會駐法《華工週報》，教華工讀書認字、寫家信。1917～1919年間，受派遣赴法國華工總數約15萬人。^⑤據統計，至1920年，至少有20%的華工完成了600字課程。^⑥陳三井認為，雖然基督教青年會為華工所提供的服務並非獨一無二，但卻是所有機構中最具規模及最有組織的，而且基督教青年會的工作也是最持之以恆的。在短短一年半後，法國華工教育運動便成為一項回饋祖國的創新性事業。1919年4月1～3日，基督教青年會法國華工幹事一致通過向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提交陳情書，由史譯宣、王正廷及蔣廷黈負責草擬，希望將法國華工青年招待所(Y.M.C.A hut)的實際做法作為實驗應用於中國的平民教育運動。

二十世紀初，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組織已經形成一定規模。尤其是作為中國首個城市青年會的天津青年會，以“發揚基督教精神，團結青年同志，養成完美人格，建設完美社會”為宗旨，圍繞德、智、體、群四育開展了大量包括社會慈善、移風易俗、傳播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現代衛生觀念在內的義工運動。^⑦“五四運動”前後，知識分子中迅速興起平民主義教育思潮，基督教青年會是最早將此思想付諸實踐的團體之一。開展平民教育成為“智育”的一項重要內容。此外，1923年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主張基督教青年會通過自我賦權，以自身“維護培養人格之能力”^⑧，將“人格運動”視作拯救“垂危的中國青年唯一的途徑”^⑨。儘管“平民教育”提出時間較“人格救國”時間更早，但當“人格救國”運動確立後，則將平民教育運動轉作“人格救國”運動的一項事工。^⑩因而，平民教育越來越受到基督教青年會的重視。這種重視源自於對近代天津人文社會環境漸趨惡化的警覺。清末民初，時值天津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大量災民、破產農民及開埠之後的手工業者、苦力、商人相繼湧入，致使人口急劇增長。民眾素質低下、教育方式落後等問題不僅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反而隨著政局動盪不斷加劇。

來會理在1897年的季度報告中闡述了對於天津教育的觀點，並據此選擇在天津成立基督教青年會。首先，天津是非教會組織管理下發展新式教育的重要中心，處於中國領先地位。如果天津青年會的工作進行順利，就意味著基督教青年會勢必將對這裡數量眾多的教育機構產生深遠的影響。其次，天津作為北京附近的港口城市，各類學校在未來有可能對中國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天津學生極有可能在中國的政治機構中擔任重要職務，將有助於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再次，當時天津的6所學堂裡僅有約500名學生，而在不久之後，這些學堂學生總數將達到數千人。這500名學生中有近10%信奉基督教，他們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在於其來自教會學校。基督教青年會應趁教會學校還佔主導位置的時候，加強工作，才能保持基督教青年會的優勢地位。如果工作推遲，天津青年會的參與基礎會更加薄弱。^⑪

另外，據統計，天津周圍的農村（天津縣管轄區域）文盲人數較多。以1921年為例，天津縣共有945,120人，照各國教育統計原則算，每100人應有滿學齡兒童13人，則天津應有上學兒童12萬，而此時天津的在學兒童是27,760人，也就是說，在天津只有20%的兒童有機會進入學校學習，未能進入學校的近80%的兒童不念私塾就失學。^⑫

天津民眾受教育嚴重不足的情況受到政府、社會團體的注意，在各方努力下，成立了一定數量的教育機構。如1919年10月中旬起，天津的男女青年學生在津門先後迅速創辦了平民夜學校、平民女學校、國民半日學校、人力車夫休息處、露天講演團等七種面向不同職業、年齡、性別群

體的平民的教學組織。^②天津縣縣長指令天津縣教育局制定了平民教育計劃，授意青年協會書局出版晏陽初主編的《平民千字課》。當時，天津警察廳雖然有貧民學校，但只是工廠，貧民學校的“學生”通過加工產品，給學校的開辦者帶來利潤。得知平民學校消息後，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致函天津縣教育局，表明擴大生源、調整學習內容的意願，希望天津縣教育局為其聘請教員。天津縣教育局因師資緊缺，未能予以解決。二十世紀 20 年代，動盪的政局使政府興辦的教育受到影響，但其對平民教育的支持又為民間團體興辦教育、滿足民眾需求提供了基礎和保障。

三、基督教青年會的平民教育事工

儘管清末以來各種新式學校不斷湧現，但單純的學校教育無法兼顧民眾的知識普及，政府所辦學校具有一定的社會教育、職業教育的性質，這也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但由於清末以來國家政局不穩，政府無力全部承擔社會教育的責任，所以由教育團體和教育家推動發展的平民教育成為熱潮。儘管平民教育最初在教育行政上不屬於政府推動的社會教育事業，但在五四運動前後也成為社會教育的中心內容。與清末以來天津青年會興辦的青年會夜校和職業學校相比，平民教育的對象不特定，往往是文化程度更低的普通民眾。在平民教育的洪流中，天津青年會秉持“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發揮了應有作用。

1922 年，天津青年會會長、著名實業家、慈善家雍劍秋有感於“本埠男女兒童多有未受過教育者，雖學校林立，而自備學費，貧寒兒女之失學者，實非淺鮮”^③，決定由天津青年會發起成立旨在“專辦平民學校，使貧寒兒童，皆有受教育”的社會服務團。3 月 4 日，天津青年會社會服務團成立。為了提倡平民教育，社會服務團隨即決定在河東水梯子借耶穌教會會所創建第一平民義務學校。^④學校的教員、職員由該服務團團員擔任。3 月 30 日，第一所平民學校開學，邁出了天津青年會積極興辦平民教育事業的第一步。同時，社會服務團還舉行了“天津平民教育運動遊行大會”。有“天津新學書院、公立培華義塾、維一社少年義勇隊、維一社義務小學校、學生同志會之四處義務學校、青年會職工部、義務國民學校、沈王莊基督教通俗學校、水產學校附設平民學校、國民生計學校、社會服務團，共男女學生千餘人”^⑤，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

1923 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成立，雖使得平民教育運動的中心從城市轉移到了農村，但天津青年會的平民教育運動依舊延續，並呈現了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來自城市的經驗。自 1923 至 1925 年，天津青年會共開辦了 4 期平民教育學校，報名者十分踴躍。^⑥其中“教員約有 20 餘人，擔任義務，日日不解”。對平民教育學校的課程，天津青年會進行了詳細規劃和精心設計：“於學生之健康、衛生、遊藝、運動、家政、公民、道德、國歌等均有相當的訓練，俾造就完全國民，漸漸可以改良社會云。”^⑦天津青年會的設想，充分凝聚了其創辦教育的經驗，將“教育”與“培訓”有機地結合起來。“教育”所要達到的目標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訓”所要達到的目的則是增強人對社會環境以及工作崗位的適應性，提高其在公共領域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進而達到淨化人心、助力養成完美人格，最終改良社會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天津青年會推廣“平民教育運動”的經驗得到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認可。為了同天津青年會進行有效溝通，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代表多次前往天津青年會東馬路會所發表演說。1927 年，天津青年會“特請北京平民教育促進會鄉村股主任傅葆琛博士主講，以《平民教育實施法》為題”^⑧，分享在鄉村推廣平民教育運動的方法和經驗。借助城、鄉之間的經驗互通，天津青年會的平民教育事業的深度和廣度都得以提升。

1924年7月14日，由天津青年會所辦的河東沈王莊基督教會通俗學校附設的平民女子學校開學。主席竇英堂致詞稱：“本校自招生以來，報名求學者，非常踴躍”^②。開學兩月，即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績。為了宣傳平民教育，擴大大學校影響，王效泉於是年9月13日代表學校召集全校學生舉行交誼會，由學生唱詩、祈禱、演說、表演武術等。

1925年9月13日《益世報》曾載《平民教育畢業誌盛》一文，讚譽天津青年會職工部的平民教育成績：青年會職工部第三期平民學校畢業時，“到會者執教員畢業生五十餘人，學生家長及來賓五百餘人，濟濟一堂，頗極一時之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天津平民教育深厚的民眾基礎。

平民教育是社會改良和重建的重要手段。近代許多團體和有識之士認為“愚、窮、弱、私”是中國社會的頑疾，天津青年會認為要改良社會，建設人間的“上帝之國”，就必須消滅這四種弊病，基督教青年會的平民教育也是據此而展開。天津平民教育的開展，為提高普通市民的文化修養和素質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平民女子學校和貧困兒童學校的創辦，則擴大了現代教育的覆蓋面，為很多本不能享有基本教育的婦女和貧困兒童提供了接受先進文明的機會。這對現代文明觀念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培育和養成意義非凡。

四、基督教青年會團體會員的平民教育事工

天津青年會具有鮮明的團體特性，它以社會團體的形式，借助社會服務的方式，動員社會力量，開展社會活動。在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中進行基督教的宣傳，是“服務社會的強有力機關”^③。隨著天津青年會舉辦的平民教育影響日益擴大，聯青社、勵青社、福利社、少年求實團等會員團體也結合自身特點和優勢，舉辦了一系列平民教育活動。

基督教青年會下屬的聯青社秉承“以義務為權利”的社訓，倡導社員堅持“積極的、前進的、創造的、肯犧牲自己的態度”^④。1932年初，聯青社出資成立“拾球兒童（貧困子弟）義務學校”。該校以教育為目的，以3～5元的代價，臨時僱用10幾個兒童，以普及教育，授以平民千字課及各種教育性遊戲。^⑤

1931年4月和1935年3月，聯青社分別在河東沈王莊教堂、河北南竹林村設立平民服務所，所內舉辦民眾補習學校和平民半日學校，並提供報紙閱覽、演講會、代寫書信、兒童遊戲場等服務。^⑥民眾補習學校每期為7個月左右，僅招收五六十人。學生畢業後，由學校介紹到各省市、私立高級學校肄業，成績優秀者書籍學費由該校負擔。半日學校學制四年，不收學費，免費發放書籍。學生均為貧苦兒童，每天下午上課，科目與市立小學相同，分國語、常識、衛生、美術、工作、算術、公民等，按複式班教學。為擴大影響，面向社會的演講成為組織者最常用的方式。服務所每週日下午舉辦通俗演講會，邀請名人主講，講題分別圍繞衛生、德育、改良風俗。演講48次，聽眾達2,400餘人次。^⑦為宣傳平民教育運動，1936年2月，聯青社也組織“識字運動宣傳隊”，於電影院及街道空地處，召集學生民眾，舉行露天演講會，擴大活動效果。此外，為了鍛煉兒童體魄，輔導兒童服務社會，服務所成立兒童勵進會，每週日聘請各校教師擔任訓練工作，每50人組成一團，團員達500人，多為附近小學的學生。^⑧

1934年3月，天津青年會勵青社在天津青年會巴黎道分會亦成立平民補習學校，於9月23日舉行了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這次畢業生共約40人。^⑨10月22日，勵青社平民補習學校舉行新一屆開學典禮，從這學期開始，學校分為高、初兩級，招收貧苦青年入學，教師由社員擔任。

1935年8月，天津青年會福利社籌創的“西沽小學校”開學。該校由育才小學校易名而來，

設有初級 4 個班，男女學生共 100 多人，為減輕貧苦家庭的壓力，學校將學費減低為每學期只收一元錢，同時還為一些貧苦無力求學者免除學費。學校教師由師範學校畢業且有教學經驗者擔任，教材遵守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的標準。此外，該校還在學校內附設平民識字班，免費招收一些中年失學者入學識字。

同年 9 月 16 日，以“實事求是”為團訓的天津青年會少年求是團成立，隨即於 11 月 29 日在三義莊愛育服務社開辦半日學校。^⑤該校共有學生 34 人，教師由該團團員房德印、胡寶清、王遠馨等人輪任。學生所用課本為商務印書館經理施敬康捐助。青年會少年部友愛團也秉持“發展少年四育、輔助青年會服務社會”之目的，為“貧苦無告目不識丁之兒童”講授識字課。^⑥

晏陽初推行平民教育運動時，尤其注重因材施教及教學方式的多樣性，強調應當分別針對青年和少年有不同的授課風格。他對於教育內容的界定是多方面的，形式也不拘泥於一種。^⑦天津青年會創辦了平民服務所、平民義務學校、半日學校和文化補習學校等類型多樣的教育機構，形成了包括演講、遊戲在內的教育形式，亦關照了女性、兒童等相對弱勢的群體，成為天津青年會開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其服務社會的主要內容。天津青年會富於針對性、受眾較為廣泛的平民教育事工，能在一定程度上聯繫普通民眾，對於普及知識、開啟民智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結語

作為一個跨宗派的基督教團體，基督教青年會既是發源於西方世界的宗教團體，又是一個帶有全球化性質的社會運動。北美協會的世界服務以及“巴黎本旨”的確立，都是其“全球化”進程的重要推動力。青年會在中國的傳播與擴展，則體現出了“全球化”與“地域化”的互構。不可否認的是，帶著“這一代令中國基督化”的使命，北美協會以及眾多學生海外志願傳教運動的參與者於十九世紀末登陸中國。作為中國第一個城市青年會，天津青年會初創時期筆路藍縷。此外，二十世紀前二十年已經開始了致力於改造青年人格、心靈的各項事工。

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戰促進了具有基督信仰的中國留美青年平民意識的增長，他們因而致力於關注平民、幫助平民。效果較為顯著的在法華工識字運動，更使留美青年進一步認識到平民在智性和德性上的更新乃是上帝國度得以實現的關鍵，因而教育平民成為知識分子絕不能推卸的責任。面對危機深重的祖國，平民教育的積極倡導者晏陽初認為，“中國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教育界可以支配中國，支配前途，改造社會”^⑧。作為知識分子的平民教育推動者自我賦權，希冀通過教育手段拯救國家，這無疑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近代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政治動盪與社會變動，國家權力日漸削弱，政府既無法實現過去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也無力承擔許多近代以前通常屬於政府職責範疇的社會服務職能，社會教育也不能有效實行，這無疑給基督教青年會的發展預留了社會空間。二十世紀 20 年代開始，知識分子主導的平民教育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社會各界、不同背景的民間團體紛紛行動，形成各自的特色。天津青年會認識到，在中國民族危機深重的歷史背景下，救治國難是整個中國社會有識之士的課題，也是難題。以此為中心，天津青年會倡導“人格救國”，冀圖建立“基督教化”的中國社會秩序，以改造中國社會。事實證明，天津青年會在普及文化知識、發展現代教育、提高民眾文化素質、促進天津城市發展等方面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然而，天津青年會通過傳揚社會福音思想來感化青年、培養基督人格、解決社會問題的構想，也受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批評，而且還遇到來自社會各界人士的壓力。受巴黎和會後民族主

義浪潮影響，青年會在人們觀念中漸漸從代表著西方先進文化的組織，開始轉變成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文化侵略”的機構。“非基督教運動”盛行的二十世紀 20 年代，作為一個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社會服務組織，天津青年會與政府、其他社會團體一同興辦平民教育，實行世俗化和政治化的發展路徑，不無重建合法性的考量。另外也應當認識到，天津青年會所希望建立的“基督教化”的社會秩序，也因與中國傳統觀念和近代中國社會現實的矛盾、衝突，是難以實現的。儘管如此，天津青年會為在近代中國傳播西方文明、培養青年高尚人格、解決現實問題、實現社會和諧等方面而開展的各項事工，需要進一步審視和分析。

① Nicolas Standaert, *New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83, No. 4 (October 1997), pp. 573-613.

② 所謂“衝擊—回應”模式意在將中國描繪成一個缺乏向上動力、停滯不前的社會，只有經過西方的衝擊，中國才能擺脫傳統的束縛向前發展。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

③ 列文森開創的“傳統—現代”模式強調傳統的儒教中國與現代的科學理性從根本上是對立的，儒家傳統在走向現代的旅程中已經逐漸失去其價值。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價值觀則誕生於西方。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④ 所謂“中國中心觀”範式是指：其一，是從內部的標準界定中國的歷史；其二，重視區域史研究；其三，將中國社會分為不同的階層，特別要關注社會下層群體；其四，借鑒其它學科的理論方法，將其與歷史分析相結合。參見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⑤ Robertson R.,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 183.

⑥ 吳梓明：《全球地域化視角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 年；吳梓明、李向平等：《邊際與共融：全球地域化視角下的中國城市基督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⑦ 參見《“基督宗教與文明人格的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東汕頭：汕頭大學文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2012 年，第 1 頁。

⑧ 來會理 (David Willard Lyon)，1870 年生於浙江寧波，父母是在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美期間，他曾加入基督教青年會，參與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1895 年來華創設天津青年會，後擔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第一任總幹事。

⑨ 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1895 年成立的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是中國第一個城市青年會，但也有部分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如張志偉認為 1895 年成立的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只是“發展學校工作的起點”，而 1900 年成立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才是中國第一個城市青年會，參見張志偉：《基督和世俗化的掙扎：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研究（1900～1922 年）》，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 年，第 14 頁。韓玉霞也認為，1895 年來會理創辦的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是校際間青年會，還算不上城市青年會，參見韓玉霞：《青年會改良中國社會的實踐及其影響》，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天津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29 頁。

⑩ 梁冠霆：《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尋——北美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研究 1909-195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63、83 頁。

⑪ 晏陽初 (James Y. C. Yen, 1890～1990)，1913 年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後獲耶魯大學學士學位及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曾跟隨基督教青年會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服務，回國後成為平民教育運動的發起者。

⑫ 陳三井：《歐戰與華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2，1986 年，第 33～34 頁。

⑬ Paul C. Fugh, *Recent conditions of the Y.M.C.A and the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Christian China*, February 1921, p. 153.

- ⑭侯傑、馬曉馳：《以“愛”和“公義”之名：天津青年會義工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改良評析》，長春：《社會建設》，2016年第1期。
- ⑮《余日章君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大會諸同志書》，上海：《青年進步》，第67冊（1923年11月）。
- ⑯袁訪賚：《余日章傳》，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8年，第55頁。
- ⑰李志剛：《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提倡“人格救國”及其反響》，溫哥華：《維真學刊》，1998年第1期。
- ⑱David Willard Lyon, Report of D. Willard Lyon, the First Quarter 1897, pp. 22-23.
- ⑲《天津縣小學教育狀況》，北京：《新教育》，1921年第3期。
- ⑳《〈少年世界〉介紹天津學生辦教育的情況》，載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編寫組：《五四運動在天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88～592頁。
- ㉑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天津文明》，第135～136頁。
- ㉒《救國運動中之面面觀》，天津：《益世報》，1922年3月22日。
- ㉓《平民校遊行詳誌》，天津：《大公報》，1922年3月14日。
- ㉔《平民教育開幕會誌盛》，天津：《大公報》，1924年3月5日。
- ㉕《平民教育之發展狀況》，天津：《大公報》，1924年3月10日。原文為“解”，現作“懈”。
- ㉖《青年會消息》，天津：《大公報》，1927年4月17日。
- ㉗《河東平民教育之進行》，天津：《益世報》，1925年7月15日。
- ㉘顧子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二十五周年》，載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鑒》，上海：中華續行委辦會，1921年，第202頁。
- ㉙《聯青社組織的意義》，天津：《大公報》，1935年10月7日。
- ㉚《青年會網球場續招新會員·為拾球兒童設平校》，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4日；《聯青社第四屆夏令球場兒童補習學校工作詳細情形》，天津：《大公報》，1935年10月7日。
- ㉛《聯青社平民服務所事工報告》，天津：《大公報》，1935年10月7日。
- ㉜《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事工報告》（1933年），第23頁；《事工報告》，1935年，第45頁。
- ㉝《兒童勵進會 定期開聯歡大會》，天津：《大公報》，1935年10月25日。
- ㉞《聯青社、勵青社平民補習學校 分別於今明兩日畢業》，天津：《大公報》，1934年9月22日。
- ㉟《青年會少年求是團成立》，天津：《大公報》，1934年9月16日；《半日學校招生》，天津：《大公報》，1934年11月29日。
- ㊱《青年會少年友愛團 舉辦貧兒暑期學校》，天津：《大公報》，1935年7月31日。
- ㊲晏陽初：《平民教育的真義——“平民教育”與其他教育的關係》，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1919～1937），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8～110頁；《平民學校教材問題》，第100頁。
- ㊳晏陽初：《平民教育》，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1919～1937），第51頁。

作者簡介：侯傑，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曉馳，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責任編輯 陳志雄]